・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一期 2017年4月 頁 127-171 研究論文

表演認同作為其他途徑的政治: 澳門網民的實踐經驗*

林仲軒**

投稿日期:104年10月16日;通過日期:105年5月8日。

本文引用格式:

林仲軒(2017)。〈表演認同作為其他途徑的政治:澳門網民的實踐經驗〉,《新聞學研究》,131:127-171。

^{*}本文得益於澳門文化局所資助之澳門網絡文化研究(1995-2011)項目,特別是項目負責人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的資助和指導。曾於2011年12月在中國網絡傳播研究學年會澳門國際會議發表本文,對與會者的寶貴意見在此致以謝忱。同時,對所有協助完成本論文之受訪者一併致謝。

^{**} 林仲軒為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研究員, e-mail: lzhongx55@sina.com。

《摘要》

本研究以澳門網絡身份認同為研究焦點,結合文化研究的權力關係、抵抗等問題意識,採取民族誌學的研究方法,基於對澳門主要網絡平台的參與式觀察及對相關人士的深度訪談,檢視網民在這些網絡媒體上如何具體表演其認同的力量:如何在網絡異質空間抵抗官方主導性支配性的「愛國愛澳」論述及其「中國人」身份認同方案?如何凝聚更具本土意識的「澳門人」情感社群以重建可能的抗拒性身份認同?如何應對「愛國」「愛澳」認同的「共謀」而另闢蹊徑借創意行動為青年世代的計劃性身份認同提供可能的表演路徑?

<u>關鍵詞</u>:表演、身份認同、澳門網絡、異質空間、情感社群、 行動路徑 2016 年 3 月,中國大陸爆出「非法疫苗」事件,涉案非法疫苗經營者在過去六年向中國 24 個省市大量供應無效或過期疫苗。事件不僅在大陸造成恐慌和信任危機,在澳門網絡也引發了熱烈討論。澳門網民不僅關注事件的進展,更擔心大陸家長會帶孩子來澳門接種疫苗而影響澳門疫苗的供應:「一定要保障本土人先啦,這個是政府責任」(網民Andy);「政府應該保護澳門居民」(網民Candy);「這是我們的澳門!澳門的疫苗,保障澳門人,而不是中國人!」(網民Bunny)。事件一週之後,澳門衛生局正式宣佈,澳門疫苗只限澳門居民使用,不會供應非澳門居民接種。關於中國大陸一個普通公共安全事件的討論,最終演變成為了澳門網民表達「本土人」、「澳門人」、「中國人」認同意識的契機。網絡不僅增加了澳門居民公共討論的渠道,也擴展了澳門網民表演身份認同的空間。這種網絡空間的認同表演,具體是如何展開的,與澳門傳統「愛國愛澳」認同建構方案有何脈絡關聯,又能為澳門認同政治打開怎樣新的想像空間?

壹、澳門的網絡社會與身份認同

1995 年,澳門正式向市民提供互聯網服務,之後澳門互聯網一直保持穩定發展並已進入成熟階段。2015 年,澳門的互聯網網民數量已經達到45.6 萬人,居民上網率為76%,相較於1995 年時3%的上網率已經增長逾25 倍(澳門互聯網研究協會,2015a)。以住戶為單位來看,官方數據顯示,2010 年至2014 年,澳門使用互聯網的住戶比例也從75.9%增至84.3%(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5)。2015 年針對大學生的最新調查則顯示,澳門大學高達98%的學生會每日瀏覽社交網站,甚至51%的學生會每天花費1至3小時使用社交網站(張愛華、謝成盛,2015年10月19日)。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一期 2017年4月

80% 50 70% 70% 70% ^{72%} 64% 66% 45 70% 40 53% 55% 60% 35 46% 50% 30 33% 25 40% 20 30% 15 20% 10 3% 4% 6% 10% 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 網民數量(萬人) → 上網率(%)

圖一: 1995 年-2014 年澳門網民數量及居民上網率統計

資料來源:改繪自〈互聯網普及程度:網民數及上網率〉,2015a,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



圖二:2010年-2014年澳門住戶上網比例變化

資料來源:改繪自〈2014 年住戶使用資訊科技調查〉,2015,澳門統計暨 普查局。

不使用社交媒體, 2% 5小時以上 12% 3-5小時(不合小時) 65小時) 50% 使用社交媒體, 98%

圖三:2014 年澳門大學生網絡使用情況調查

資料來源:改繪自〈澳大學生愛上社交媒體 臉書微信最受歡迎〉,張愛華、謝成盛,2015,《澳大人》。

隨著澳門網絡社會的崛起,澳門網絡文化日益豐富,網絡已經日漸成為澳門文化抗爭的重要場域,同時,也擴展了澳門身份認同想像、表演、抗爭的空間。特別是隨著是論壇、Facebook等社交媒體的發展,澳門網絡社會在傳統現實社會的身份認同空間之外開拓了更加廣闊、開放和自由的場域。特別是,澳門身份認同問題背後是其深遠的歷史根源、特殊的政治格局和複雜的社會環境,為身份認同在澳門網絡的表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實際上,由於澳門的身份認同混雜了民族性、殖民史、全球化、本土化等複雜因素,已經受到了學界的一定關注(仇國平,2011;周大鳴、李居寧,2007;林玉鳳,2011a;黎熙元,2005;Chou, 2010; Ngai, 1999)。這些研究主要是側重澳門身份認同歷史上的

混雜性,以及這一混雜性的演化路徑,特別是回歸前後葡國殖民政府、中國中央政府、澳門特區政府的身份認同建構方案的區別——如何通過不同的策略建構不同內涵的身份認同混雜性以因應各自的統治政治(Lam, 2010; Kaeding, 2010)。但是,這些研究數量上非常有限,特別是相對於其毗鄰且有一定可比性的香港而言,澳門身份認同的研究關注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且,這些研究雖然有一定的歷史縱深感,但也因此往往比較陳舊,研究場域完全侷限在傳統現實社會,從未觸及網絡空間和網絡社會中的身份認同問題。同時,其研究取向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視角,關注統治政治的身份認同建構方案,而很少涉及被統治者、被建構者的自主實踐和認同力量。因此,從自下而上的視角,關注澳門網絡社會中網民的認同力量並探索其背後的政治意涵,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研究價值。

網絡社會與認同力量,是 Manuel Castells 信息時代三部曲所關注的兩個核心問題。Castells (1996) 認為,以資訊科技和網絡技術為中心的技術革命,已經、正在、並且將繼續重新塑造我們的生活地景,建構一種新的社會型態——「網絡社會」。而在資訊科技革命、網絡社會興起、資本主義重組、全球化進程加速的另一面,是身份認同的日益彰顯,因為在這一全球流動的網絡社會裡,對於身份認同的追尋,成為了社會意義的基本來源,甚至是唯一來源(Castells, 1996, 1997)。Castells (1997)將這種身份認同的彰顯稱為「認同的力量」或者「認同的權力」,認為「權力不再集中於機構(國家)、組織(資本主義企業)和符號的控制者(公司制媒體、教會)之手。它散布在財富、權力、信息與圖像的全球網絡中,在可變的幾何學和虛擬化的地理學系統中傳播和嬗變……新的權力存在於信息的符碼之中,存在於再現的影像之中;圍繞著這種新的權力,社會組織起它的制度,人們建立了自己的

生活,並決定著自己的所作所為。這種權力的場域是人們的心靈」(Castells, 1997, p. 359)。Castells 還進一步提出了「合法性身份」、「抗拒性身份」和「計劃性身份」三種不同的身份認同作為系統分析的主臬,分別指涉社會中的主導性支配性身份認同,對這一支配性身份認同的抵抗,以及可能的新的身份認同的建立。Castells 對認同力量的關注,一方面是其網絡社會理論的發展深化,從技術範式、發展方式、社會形態進一步向精神文化層面深化,試圖將其從信息中心的網絡邏輯中解放出來,接合成為一種倡導全面性、複雜性、靈活性的綜合文化;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其信息主義理論所蘊含的「技術決定論」所遭受的批評,即儘管信息技術被視為網絡社會的基礎和核心,但身份認同卻賦予了這一新的社會形態以意義、精神、文化,甚至生命。

Castells 這一研究脈絡對探索澳門網絡社會中網民的認同力量非常有借鑑意義,但是,需要注意其理論與實踐意義上的侷限。首先,Castells 基本是將論述的脈絡放置於全球化、資訊化的大背景,是一個碎片聯接、整編統一的全球系統,更多的是著眼於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經濟、政治等宏觀制度層面,以及其下的媒體文化、都市生活、全球政治與時空性質等方面的技術變遷影響及其身份認同意義,而且,基本是以美國、歐洲、拉丁美洲的經驗研究為基礎,因此,這種認同力量的探索,既缺乏細節化的微觀實踐經驗,也缺乏在地的亞洲情境分析。其次,由於缺乏這種情境分析和微觀實踐的經驗研究,儘管Castells(1997)充分論述了認同力量的重要性,但是沒有通過具體的實踐案例分析,充分解釋這一力量從哪來,往哪去,怎麼產生,怎麼運作,只是提供了最終結果論述而缺乏了相應的過程分析。再次,power不僅是一個既定的靜態名詞——「力量」,同時也是一個含有系列過程的動詞——「權力」,Castells 注重結果論述而非過程分析的深層原

因,就在於其過於樂觀地看待身份認同的力量,並將 power 劃約為一個理所應當的「力量」,而不是一個具有鬥爭性、過程性、策略性的「權力」。其「合法性身份—抗拒性身份—計劃性身份」的分析框架雖然對此有所觸及,但更多的仍然是作為認同力量的分類描述,而不是動態的分析系統,缺乏每種身份認同之內、之間的權力關係分析以解釋誰有權力賦予、抵抗、爭取這種認同的力量。

因此,本研究希望延續並繼續推進這一研究路徑,以澳門網絡社會 的認同力量為研究焦點,一方面,希望在 Castells 的網絡社會和認同的 力量的基礎上,提供一個更在地化、差異化、微觀視野的經驗研究;另 一方面,嘗試從「表演」的視角,探索在澳門特定脈絡下身份認同的具 體表演過程,以期捅過這一具體實踐研究為認同力量提供某種可能的過 程性、路徑化的解釋。身份認同的表演性是身份認同研究反本質主義理 論脈絡的一個研究視角,強調身份認同沒有確定無疑的代代傳承的本源 定律,而是由歷史文化語境創作的、不穩定的、完全開放的定義(Hall, 1990、1992) ,是一種文化和社會建構——更具體來說,是诵過身體、 話語、行為的特定姿態、執行和動作的重複表達、表演來建構的:「身 份認同是由被認為是它的結果的那些『表達』,通過表演所建構的」 Doran (2012) 和 Cover (2012) 等人,都直接從「表演的身份認同」 (performing identity)的視角,探索身份認同如何通過具體的表演實踐 被破壞、配置以及重建,而網絡又為這種表演實踐提供了怎樣新的空間 和可能。

本研究遵循這一「表演的身份認同」的研究取向,並將傳統的澳門身份認同問題,延伸到澳門新興的網絡社會;不像 Castells (1997, p. 359)那樣把認同力量的場域圈定在「人們的心靈」而成為某種本質的

存有,而是將其視作一種過程性的表演行為,並將表演的場域聚焦到網絡空間,關注澳門網絡社會中微觀層面的網民主體如何通過其身份認同的抵抗、重建與行動的實踐,表演其有澳門特色的認同力量,而這種認同力量的表演,又為澳門網民提供了何種其他途徑的政治。

貳、地方性知識的虛擬民族誌

在此研究取向之下,本研究所指涉之網絡身份認同,實際也包含著全球的普適性與在地的獨特性的對立與統整,試圖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之內,將研究的脈絡具體到澳門在地的實踐,換言之,將澳門網絡身份認同視作一種「地方性知識」(Geertz, 1983)。同時,網絡身份認同不僅僅只是被視作網絡社會中的虛擬化「想像」(Anderson, 2006),更是被視作一種另類的具體在地「實踐」,強調網絡身份作為網絡文化的意義來源,同樣是特定化、情境化的,並有長期的、地方的、具有一定語境的理論要求。因此,澳門網絡身份認同的「地方性」是一種雙重的在地化,不僅包括從全球到澳門的在地化,也包括從虛擬到現實的在地化,以及可能的線上與線下的交融。

為了達到這種雙重在地化,本研究主要採用民族誌學的研究方法, 具體而言,是網絡民族誌或者虛擬民族誌。¹ 民族誌學的研究方法已經 被廣泛應用到網絡文化研究中,並展現出其獨特的理解、闡釋能力,特 別是其能頒過民族誌學者的自我調整以適應環境,使研究者對網絡更富

¹ 不少學者對網絡研究的民族誌提供了定義。比如,Kozinet(2010)就結合了「網絡」和「民族誌」兩個詞而造出「網絡民族誌」,並提供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在網絡上進行的民族誌;是一種定性,解釋性研究方法,使傳統的人類學民族誌現場研究技術適用於通過計算器媒介通信形成的網絡文化和社區的研究(Kozinets, 2006, p. 135)。」

有闡釋的彈性(Hine, 2000)。但是,民族誌過於依賴當下的田野,很難在田野的地理空間維度之外探索田野背後的歷史時間維度,因此無法擴展民族誌研究的歷史脈絡,需要輔以一定的檔案研究、深度訪談、話語分析等研究方法,以探索田野深處的歷史和社會意義。特別是當這個田野變成網絡的虛擬空間之時,傳統民族誌研究「肥沃」的真人實時交流田野已經流失,虛擬民族誌者面對的實際是相對「貧瘠」的田野——靜態的網絡文本本身而非文本背後動態的人際交流情境和表演行為,因此更需要走出虛擬的空間,探索現實田野、歷史檔案和社會調查。

基於這種探索的精神,本文並不僅僅將民族誌視作一種符號性文本,而是一套文化描寫系統,一種身體力行的方法論,將研究建立在長時間的田野調查之上,特別是結合了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打破虛擬與現實的界限,不僅有虛擬網絡平台的參與式觀察,還有現實世界的深度訪談。深度訪談與參與式觀察的結合,一方面是在 Geertz (1983)所強調的「土著的眼光」的民族誌學立場之外,即在通過「網民的眼光」來描繪之外,也通過「網民的嘴巴」來講述;另一方面則是在 Hine (2000)所強調的虛擬民族誌「流動」和「連接」的組織原則之外,機動起來探索虛擬與現實的疆界,特別是虛擬空間表演與歷史社會現實的關聯問題。

在具體的操作上,本研究的虛擬民族誌主要是基於三年時間的田野觀察,以及五組面對面深度訪談。田野觀察主要以 Qoos 討論區、CyberCTM 討論區和 Facebook 群組三大平台為主要的田野觀察對象,因為這三者是澳門最主要的網絡平台。根據 2011 年《澳門互聯網使用現狀統計報告》調查顯示,Facebook 已經在 2010 年超越討論區,成為澳門網民上網的第一平台,但 CyberCTM 和 Qoos 仍然是澳門網絡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張榮顯、盛綺娜,2011)。面對面深度訪談

主要是訪問網上活躍的人物、討論區管理員、特定文化現象的參與者、以及對澳門網絡文化有獨到見解的人士,得到更多網絡背後的故事、想法。

叁、認同抵抗的異質空間

澳門的身份認同一直以來就是「難以表述」的,因為歷史上,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門一直沒有建立國家身份認同,澳門人民對殖民者亦沒有歸屬感(黎熙元,2005)。澳門只是「既由葡人管治又受內地政權影響的地方」;相應的,澳門人民也只是「在中葡兩國之間默默謀生的沈默的、樸素的人群」(林玉鳳,2011a),「沒有名字」,「無名無分」,無法辨清自己的身份(曾一果,2012)。就如一些澳門詩歌作品所表現的:「想起霧降臨以前/聚焦鏡正在尋找/鎂光燈也在尋找城市/只是我們/記錄者和被記錄者/都在閃爍發亮的幾個瞬間/忘了那個世紀的歷史/忘了那個城市的名字,遺忘啊遺忘/記錄者和被記錄者。//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沒有名字/如此而已/我也沒有名字/如此而已。」(林玉鳳,2011b)。這種身份認同的空白,放置在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實際給不同的政治力量提供了更多身份認同建構的可能性。當然,這是一個長期拉扯互動、角力鬥爭的過程,其中一個標誌性事件、轉折點是 1966 年的「一二三事件」,2 在此之後,中國大陸主導的親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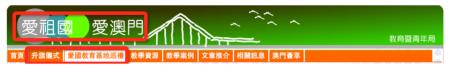
² 「一二三事件」是澳門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取名自 1966 年 12 月 3 日 發生的嚴重警民衝突。事件起因是一宗簡單的學校申請建築執照的衝突,最終卻 演變為警民衝突,導致 11 人被警察殺害數十人受傷,事件最終以廣東當局介入 令殖民政府賠償道歉終結。事件不僅令葡萄牙政府在澳門的管治威信喪失,也導 致中國大陸勢力實際控制澳門並肅清國民黨當局在澳門的勢力,從此親北京的 「愛國愛澳陣營」在澳門形成了盤根錯節的穩固力量。

京政治文化在澳門逐漸形成,其「愛國愛澳」身份認同論述的「中國 人」逐漸成為了澳門社會主導性、支配性的身份認同,某種程度上成為 了 Castells 意義下的「合法性身份」。這一身份認同不僅有其歷史根 源,也有其社會基礎,特別是具有澳門特色的擬政府化的華人社會自治 組織——社團。這些社團與中國大陸官方聯繫密切,並接受其指示,把 強調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為主體的身份認同的話語論述帶入澳門並 逐漸型構澳門人的身份認同(黎熙元,2005)。比如,澳門最具代表性 的三大社團——擁有成員最多的澳門工會聯合總會、被稱為澳門最具政 治經濟影響力的澳門中華總商會、最重要的基層組織社團澳門街坊會聯 合總會,不僅在社團的宗旨和工作方針上都突出「愛國愛澳」,也在日 常的活動、節日的慶典上都會傳遞「同宗同源、血濃於水」的信息(黎 熙元,2008)。及至澳門回歸之後,這一主導性身份認同更是得到了官 方的積極推進。比如,由官辦電視台製作愛國主義電視節目、由政府親 自舉辦或者資助舉辦國慶、特區政府成立慶典、內地交流團、軍事訓練 等,培養澳門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牛的愛國情操(仇國平,2011)。2014 年澳門特區政府甚至直接把「愛國愛澳」寫進澳門〈非高等教育制度綱 要法〉,當時掌管澳門教育政策的教育暨青年局局長梁勵對此評論道:

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以及對自己身份的認知,是回歸後澳門非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宗旨。回歸 15 年來,『愛國愛澳』的傳統薪火相傳,成為澳門青少年靈魂深處的主流價值觀。澳門需要讓下一代瞭解,澳門是中國一部分,澳門人對國家有義務和責任。〈非高等教育綱要〉說得很清楚,讓我們年輕一代怎麼去『愛國愛澳、厚德盡善』。怎麼培養『愛國愛澳』的情感呢?我們認為要在課堂中和課堂之外兩方面去實現。(黃歆、劉暢,2014年12月16日)

教育暨青年局的官網同樣把「愛國愛澳」放在第一位,與愛國教育相關的「升旗儀式」「愛國教育基地巡禮」亦先於基本的教學資源教學案例等。

圖四: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網站首頁突顯「愛國愛澳」截圖



在這種歷史、社會、政治的合力之下,澳門人對「中國人」的國族身份認同一直遠高於毗鄰的香港(Kaeding, 2010; Lam, 2010)。比如,從是否「為中國人身份自豪」的維度看,1999 年澳門回歸之際已經有63.2% 的澳門人以中國人身份為榮,回歸一年之後,這一數字更升至66.4%;而香港回歸前後這兩組數字分別為46.6%和31.6%(鍾庭耀,2001)。澳門人對「中國」的認同甚至比對「澳門」的認同更為強烈(Tan, 1999; Tang & Bray, 2000),如表一所示。而針對學生的調查也顯示(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2008),2008年澳門大學生對「我是中國人」的認同度(同意或者十分同意)高達93.3%,高於對「我是澳門人」的認同度(88.3%),如表二所示。

表一:澳門人對中國及澳門的身份認同調查

| | 為中國人身份自豪 | 為澳門人身份自豪 |
|------|----------|----------|
| 1991 | 66.9% | 53.6% |
| 1999 | 74.1% | 38.8% |
| 2006 | 79.5% | 65.8% |

資料來源:改繪自《澳門社會實錄:從社會指標看生活素質》,頁 306,余 振、呂國民,200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 = $-$ | | 海田上翔开的东外到中国木 |
|-------------|---|--------------|
| ₹ ₹— | • | 澳門大學生的身份認同調查 |

| | 十分同意 | 同意 | 中立 | 不同意 | 十分不同意 | 不知道/不適用 |
|-------|-------|-------|------|------|-------|---------|
| 我是澳門人 | 58.3% | 30.0% | 4.8% | 3.6% | 1.9% | 1.4% |
| 我是中國人 | 60.0% | 33.3% | 6.1% | 0.4% | 0.1% | 0.1% |

資料來源:改繪自《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研究報告》,頁3,2008,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面對這一主導性、支配性的身份認同,澳門部分網民開始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利用網絡消解傳統的社會界限,拓展身份認同表演的時空跨度,在網絡空間開拓了一個抵抗這一支配性身份認同的空間。網絡或可看作一個未被完全決定的、可以建構主體的空間,使得官方無法完全壟斷身份認同的敘事,而網民卻得以創造性地展現自己的抵抗性論述(Poster, 2001)。而且,這種認同抵抗不是如 Castells 所言的是對一個全球化網絡社會方案和「認同政治」的抵抗,而首先主要是對政府主導的「愛國愛澳」方案的具體的「政治認同」的抵抗。田野調查發現,在澳門的第一網絡平台 Facebook,就有不少表演這種認同抵抗的群組。

「我是葡屬澳門人」Facebook 群組於 2011 年 7 月 28 日創建,是為了「召集澳門人,表達我們對大陸人入侵澳門的不滿,告訴政府我們想回到那個純樸的澳門,做一個受國際尊重的葡國人,而不是令各國感到厭惡的中國人」。澳門殖民時期的葡國國徽加上強烈的文字聲明,很鮮明地表現出了群組的國族認同。對於他們,「葡國人」身份是「受國際尊重的」,在想像中與自我「相同」,而「中國人」則是「令各國感到厭惡的」,在想像中與自我「差異」,在這對相同與差異的比較之後,他們不再徘徊於中葡之間了,順理成章地完成了「葡屬澳門人」的身份認同界定。而在這一過程中,所謂的「受國際尊重的」和「令各國感到

厭惡的」其實只是現實世界「刻板印象」(stereotypes)在網絡世界的延伸而形成「網絡印象」(cybertype):「網絡增殖、傳播、物化種族和種族主義想像的獨特方式。」(Nakamura, 2002, p. 3)



圖五:「我是葡屬澳門人」Facebook 主頁截圖

有一些 Facebook 群組並不直接直白地表達「葡國」或是「中國」的國族身份認同,而是策略性地回避直接的國族字眼,換之以「葡國式」稱呼的 Macau 和「中國式」稱呼的 Ao-men。比如,Facebook 專頁「正本清源 Sulu Space」於 2014 年 2 月 11 日發起了名為「澳門就是MACAU,不是什麼 AO-MEN」的網上行動,通過「網絡一人一信」,電郵要求 Facebook 更改澳門的稱呼為 Macau 而非 Ao-men。在這裡,身份認同的表演,不再是直接的「宣言」或者「旗幟」,而是借澳門的「稱呼」作為一種反抗「命名政治」(politics of naming; Krips, 2007)的行動。自澳門 1999 年回歸以來,北京與澳門當局便利用聞一多先生的新詩〔七子之歌〕作為官方慶典的重要歌曲和表演儀式,3 進行「中

^{3 [}七子之歌]歌詞截取:「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但是他們擴去的是我的肉體,你依然保管我內心的靈魂。那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母親啊母親!我要回來,母親,母親!」。

國人」身份認同的建構,強調澳門一直是中國「母親」的 Ao-men,而非葡屬殖民的 Macau。而該 Facebook 專頁卻以其所謂「正本清源」的名義,針鋒相對地提出「澳門就是 MACAU,不是什麼 AO-MEN」,對官方一直以來的〔七子之歌〕式的「命名政治」提出挑戰。

圖六:「澳門就是 MACAU,不是什麼 AO-MEN!」事件 Facebook 專百截圖



除了「稱呼」,這案例同時也聲稱「保護本土文化,反對文化入侵」,並具體以語言和文字為落腳點,將粵語和繁體字視為本土文化的重要部份,指涉本土文化存活和文化清洗等問題。實際上,Castells(1997)認為,語言是身份認同的最基本屬性,它能建起「比領土更無形、比種族更排外的的邊界。」(p. 55)田野觀察發現,這種通過語言(粵語)和文字(繁體字)來表演身份認同的現象在澳門網絡上非常普遍,比較有影響的事件是澳門一麥當勞改用簡體字招牌引發的風波。事件起因是澳門本島筷子基區的一間麥當勞,用簡體字招牌替代繁體字招牌方便大陸遊客,而這個過程恰好被網民拍攝並上傳至 Facebook 群組和討論區。網民除了對此表示憤怒之外,不少網民更藉討論之機表達自己的身份認同。在討論中,「簡體字」被符號化,成為一種能指,直接指向「大陸」、「強國」、「天朝」:「麥當勞死到大陸去啦!!」

(網民 carcaka);「乍一看還以為是在強國境內」(網民愛無恨)。「這裡是澳門人的地方!!」(網民 Andy);「拒絕澳門大陸化!!」(網民 Cat);「這裡不是強國!」(網民 Hades);「好大陸啊!要求換返繁體上去」(網民 Iok);「強國人要入侵澳門了!!各位小心……」(網民 Kapou);「澳門已被強國入侵……」(網民 Kai);「中共正式令澳門淪陷」(網民 Haruka)。這種激烈的討論表明,澳門網絡的認同表演和網絡印象並不僅僅是如 Nakamura(2002)所言的,簡單地將現實刻板印象轉移到網絡世界,而是需要透過參與者間雙向、多向互動的機制進行。具體而言,則是需要網民們通過發帖、轉載、讚好、評論、討論等方式,形成一種身份認同表演的互動模式,並在互動過程中不斷相互強化身份認同(Postmes, Haslam, & Swaab, 2005)。

這一互動表演模式實際上也將網絡空間轉變成為了「書寫認同」的動態空間,體現了網絡身份認同表演有其獨特的「空間性」(Hetherington, 1998)。但是,這種書寫認同並不是一個被動的「銘刻」過程,也沒有一個既定的統一的書寫主題,反而是每個個體主動的、自由的書寫淹沒了沈默的少數而匯聚並呈現出一個較為統一的身份認同宣稱出來。同樣的,其空間性也不是一個天然平展而廣闊的空間,而是由無數去中心化的、爭議的、分歧的、甚至衝突的個體表達空間,通過身份認同求同排異的機制而將多元分散的主體以及小敘事拼接起來形成一種不穩定的論述空間。而且,作為一種網民自發組織建立的網絡虛擬空間,Facebook 群組、討論區等遊離於傳統的權力結構和話語體系之外,其空間性表現出一種類似於「異質空間」的異質化和戰術性(Foucault, 1986; Hetherington, 1998)。比如,同樣針對繁體字簡體字的爭論,有網民通過自己日常的、具體的實踐進行回應,將自己堅持繁

體字的習題本拍照發佈到 Facebook 群組。⁴ 在這裡,課本或者習題本,作為一種實體(entity),指涉一種權力的操弄,實際上是宰製規範體系下,官方身份認同建構方案的「策略」展示權力的確切地點(place)。但是網民在策略宰製之下不但沒有退縮,反而創造出不同的抵抗行為,而且通過拍照、討論、分享、傳播等「戰術」,為自己爭奪隨時可移動、更換、重組的空間(space; de Certeau, 1984/2002),一種在地點之內,又在地點之外的「異質空間」。

圖七:網民通過習題本表演認同抵抗

資料來源:取自 Facebook 網頁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412121245490300&set=a.350189475016811.71088.170737146295379&type=1&theater

⁴ 習題本要求將題目中的繁體字相應的簡體字填寫在括號中,但該同學依然在括號 內填寫繁體字,並附上一張紙條寫著「老師,我只懂繁體中文」,這一圖片同樣 引起網民的熱烈討論和分享,網友態度基本是一面倒地點讚支持其創意抵抗。

肆、認同重建的情感社群

當網民表演其認同的力量,抵抗官方主導的「愛國愛澳」論述及其「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時候,除了極少數的極端案例訴諸殖民宗主的「葡國人」身份認同之外,絕大多數網民都傾向於更為本土化的「澳門人」身份認同。借鑑 Castells「合法性身份—抗拒性身份—計劃性身份」的分析框架,如果說「愛國愛澳」的「中國人」是澳門社會主導性、支配性的「合法性身份」的話,澳門網民在進行抵抗表演的同時,也在重新建構「澳門人」身份認同作為非主導的「抗拒性身份」。

之所以是一種「重建」,是因為澳門傳統社會非主導性的「澳門人」身份與主導性的「中國人」身份是完全互容的,畢竟「愛國愛澳」本身就包含了「愛祖國」與「愛澳門」的一體兩面,前文相關的調查也顯示了兩者認同度的同步提升。澳門傳統「澳門人」身份認同其實一直與「中國人」身份認同緊密相關,這也有其歷史淵源、社會基礎和政治背景。據林玉鳳(2011a)考證,澳門中文媒體史上首次有清晰明確的「澳門人」定義出現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抗戰時期,是出於澳門居民對戰事訊息的需求,而且出於戰事影響,「澳門人」從一開始便被定義為「愛國的華人、中國人」。換言之,「澳門人」身份從誕生之日起便是依附於一個更大的「華人」「中國人」身份的。「一二三事件」之後,「愛國愛澳」的「中國人」身份更是逐漸發展成為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身份認同。不過,九十年代澳門回歸以來,澳門需要向世界和中國重新介紹自己,強調澳門的獨特性和本土性,既區別於殖民時代的澳門,也與中國內地區隔開來,這時重新定義「澳門人」的需求便日益強烈,而回歸以來「澳人治澳」的政治論述也為這種本土身份的建構提供了政

治合法性。2005 年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更是推動 了澳門人對本土歷史文化的關注,在將澳門申遺成功看成是回歸祖國的 偉大成就的同時,也視作是澳門文化對人類的貢獻,認為「澳門街」已 經是「全世界的澳門街、全人類的澳門街!」(曾一果,2012),自 此,比較有本土意識的「澳門人」身份竟借殖民時代的歷史文化遺產日 益清晰彰顯(仇國平,2011)。作為澳門社會基礎的社團在這一過程中 也扮演了重要作用。這些社團固然如前文所述基本服務於「愛國愛澳」 的支配性身份認同建構,但畢竟立足於澳門本土,「愛國」先行,也得 「愛澳」殿後,而且得落實到具體的生活中。這些社團覆蓋了澳門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方方面面,像鏈條一樣,把澳門人捆綁在一 起,同牛存、共進退,使澳門人不僅對社團有著特殊的情感,也對澳門 培養出特殊的情感(張元元,2009)。社團實際是承擔了身份認同建構 的「公社」(commune)功能,提供了澳門人身份認同的社群基礎,並 在社群之內又不斷醞釀增進對於澳門的情感(Castells, 1997)。表三為 2008 年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及澳門中華學牛聯合總會(2008)針對澳門 大學生對中國和澳門的情感依附情況調查,數據顯示被調查者對澳門的 感情依附高於中國:八成以上(82.3%)的學生明確表示「愛澳門」, 而表示「愛中國」的則為六成八(68.8%)。

表三:澳門大學生情感依附調查

| | 十分同意 | 同意 | 中立 | 不同意 | 十分不同意 | 不知道/不適用 |
|------|-------|-------|-------|------|-------|---------|
| 我愛中國 | 32.3% | 36.5% | 28.9% | 1.4% | 0.1% | 0.8% |
| 我愛澳門 | 41.2% | 41.1% | 14.8% | 1.7% | 0.8% | 0.4% |

資料來源:改繪自《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研究報告》,頁 5,2008,澳門: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但是,在信息時代,澳門的傳統計團並沒有跟上互聯網的發展,網 絡化程度並不高,還沒有完全融入網絡社會。很多傳統的社團至今已經 有超過 400 年歷史,但卻沒有自己的網站或者 Facebook 專頁。顯然, 傳統「愛國愛澳」社團社會「同生存共進狠」的特殊情感也很難直接轉 移到網絡上形成相應的網絡社群。而網絡提供了群體聚集的新工具和新 平台,帶來了社群形成的新形式。新興的網絡自發組織則更自然地融入 到網絡社會,甚至是本身就完全誕生並維係於網絡之上。而且這些新興 的網絡社群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現實社會的社團框架,自覺或不自覺地擺 脫籠罩在傳統「澳門人」身份認同之上那更大的「中國人」的身份認 同,專注於相對傳統「澳門人」身份認同而言,更具本十意識的、某種 程度上「去中國化」的「澳門人」身份認同。我們的田野調查觀察到的 網絡社群,比如「Macau 澳門」、「我是澳門人」、「澳門人•澳門情 • 澳門事」、「我愛澳門」、「I Love Macau!」等,都是單純基於澳門 的集體情感,圍繞集體情感表演身份認同,又通過這種認同表演進一步 強化這種情感的社群化和社群的情感化(Hetherington, 1998; Maffesoli, 1996)。這種網絡化的社群相對傳統現實社會的社團顯得虛擬而鬆散, 並不像澳門傳統社團那樣實質嵌入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並直接關聯具體 的生活服務、社團地位和個人利益等,網絡社群參與者只是單純依賴對 於澳門的特殊情感而進行情感交流,創造並聯結出新的網絡情感社群。

「Macau 澳門」群組和「我是澳門人」群組分別是我們田野觀察到的澳門 Facebook 第一、第二大的群組(資料截至:2012/6/16 16:05),都是基於「情感影像」而非「理性討論」而形成的情感群組。這兩個群組發表的內容多與澳門緊密相關,而且大量地運用了影像、圖片,如大三巴,東望洋燈塔,澳門旅遊塔,葡京賭場,嘉樂庇總督大橋、澳門手信等澳門象徵符號,也包括網民分享的澳門歷史照片和視頻資料,或者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一期 2017年4月



圖八:「Macau 澳門」和「我是澳門人」的 Facebook 主頁截圖

是網民自己拍攝的關於澳門的有趣照片、視頻等。幾乎每個發文都是以 圖像為主,偶爾配以極其簡單的文字說明,但卻都得到了很多的讚好、 分享、和討論。而且討論也多是好奇、稱讚、感謝、懷舊、嚮往等情感 層面的交流,特別是突出了對於澳門的集體回憶和懷舊情緒。這種歷史 共有、記憶共享、情感共同的網絡社群,實際是澳門歷史、傳統、文 化、遺產在網絡勞世界的「媒介化」(mediation)和「再停泊」(remooring; Thompson, 1995),並在網絡空間再儀式化、再情境化,最終 內化於網民的理念體系和思維模式,而成為了網民「澳門人」身份認同 自我社群化、自我合法化、並自我強化的情感社群(Gillis, 1994)。

「澳門人•澳門情•澳門事」群組則在首頁簡介便賦予澳門和群組以情感化的「人情味」:

澳門,一個與別不同的城市。既有大城市的氣勢,亦有小城市的風味。她沒有氣焰,卻有濃濃的人情味。人情味無價,如何感受才是真知灼見?通過澳門自家的資訊活動,來體會澳門最真切的感情,絕對是獨一無二的經驗。『澳門人 · 澳門情 · 澳門事』就為你送上,變化萬千的『人』,溫暖洋溢的『情』,興奮無比的『事』,當中,存在你最愛的澳門人情味。

這種基於「人情味」的情感群組,正是回應了吳國昌 1987 年便大聲疾呼的澳門「本土意識」,即對澳門的生活空間有著深厚的感情聯繫,而且這種感情往往是比較自然地從長期接觸的具體的人、情、事、物中滋生出來的(吳國昌,1987)。

這些基於對澳門的特殊情感凝聚起來的群組,不像「我是葡屬澳門人」那樣旗幟鮮明的身份認同宣揚,也沒有出現一個明顯的大陸想象作為他者或者敵人,而更專注於澳門人本身,不在乎他們的「差異」,而在乎我們的「相同」:「強調了『我們』的重要性與『共在』的盛行。而且,除了共在以外,並沒有其他目的」(Maffesoli, 1996, p. 64)。在此基礎上,「溝通的唯一目的是『接觸』他人,單純地保持聯絡,一同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一期 2017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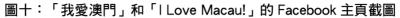
參與在一個群聚的形式中。」(p. 62)因此,在這個溝通、接觸、聯絡、群聚的過程中,重要的不是理性、討論、共識,而是情感、感覺、美學、回憶、共感、共應,其中又以情感最為重要。這種情感最終最明顯最強烈的表現就是「愛」,這也是另外兩個群組「我愛澳門」、「I Love Macau!」的表現。



圖九:「澳門人・澳門情・澳門事」的 Facebook 主頁

「我愛澳門」群組成立於 2010 年 8 月 1 日,是為了表達「很想做個澳門人」「我愛澳門!」,文字間充滿對身為「澳門人」的自豪和對澳門的愛。兩年間儘管該群組沒有很多特別有意義的討論文章發表,但卻收穫 417 人讚好(資料截至:2012/6/16 17:25)。可能,這麼多讚好的人僅僅是因為「我愛澳門」這一情感召喚而已,所以並沒有特別的文章討論,但這也正是一種情感的表現,開闢了一個獨特的情感表演空間以凝聚對澳門有共同情感者形成一個單純表達愛意的網絡社群。這種單純的「我愛澳門」的情感,在另一群組就表現得更明顯了,因為它只允

許發表「I Love Macau!」。





「I Love Macau!」群組成立於 2010 年 4 月 20 日,簡介要求「The page where you can ONLY say: I love Macau. Nothing else」。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個單純表達「I Love Macau!」的群組竟達 3,628 人讚好(資料截至:2012/6/16 15:12)。所以,跟「我愛澳門」一樣,哪怕是最簡單、最單純的情感召喚,其實也能在 Facebook 上成就一個很大的情感群體。在這裡,只能表達「I Love Macau!」而不允許其他內容,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排斥或者不作為,而是一種「創造性的不作為」(creative not-doing; Maffesoli, 1996, p. 29),一種除了情感共在之外沒有其他特殊目的和目標的自足自在的社會性,而這正是社群生成、存在和發展的根本。

這些群組都強調情緒的連結而非理性的論述,分享情緒,享受在一 起的 感覺,同時在人際關係中溝通表達,並藉助情感群化成情感群體 (Hetherington, 1998; Maffesoli, 1996)。這種情感群體往往追求氛圍、 感情和情緒連結的社群型態:扣連到情緒性團體,關照身心和美感,淬 取在地經驗, 咸受集體生活(陳雪雲,2002), 並重視每日的、當下 的、具體的和本土的實踐(Jansen, Finger, & Wildemeersch, 1998)。比 如,網民「保護龍環葡韻聲鳥林」的行動就是一種具體的本十實踐。5 2012 年澳門政府突然宣佈計劃在環葡韻鷺鳥林旁興建交通資訊安全中 心,引起廣大市民反彈,並且迅速有網絡組織開設專頁網站「保護龍環 葡韻鷺鳥林」收集市民簽名向政府表達意願。而簽名網站專頁還有網民 的個留言評論,在表達了要政府保護鷺鳥的意願之外,也在字裡行間表 現出對於澳門一種「家」形象的特殊情感:「要澳門,不要再破壞我們 的家!」、「留住澳門人的集體回憶,回憶才能形成澳門文化,文化才 是我們的根」、「救救澳門」、「保護我們美好的家園」、「請善用我 們澳門人的土地」、「澳門市民加油!!團結起來,相信我們可以 的!」「請好好保育澳門僅存的且寶貴的濕地資源,好對我們的下一代 有一個交代」等等。因為這種「澳門」、「澳門人」、「澳門文化」、 「澳門土地」、「澳門·美好家園」的集體情感,網民實際上已經形成 一個留住回憶、保護家園的情感社群,其保護鷺鳥的活動正是澳門當下 的、具體的、本土的實踐,也充分表演了一種擺脫「中國人」籠罩的、 更為單純具體的、更具本土意識的「澳門人」身份認同。

位於澳門氹仔區的龍環葡韻鷺鳥林是澳門僅有的七個淡水濕地之一,亦是頻臨絕 種的鷺鳥選擇棲息之地,每年有超過500隻約30至40不同種類的鳥類在那裡繁 殖或棲息。該區也是澳門這小城難得的自然寶庫,向來是市民及遊客親近大自然 及觀鳥的首骥。

伍、認同計劃的行動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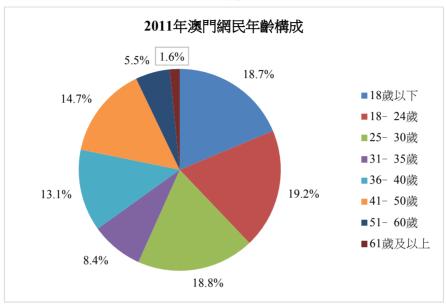
「保護龍環葡韻鷺鳥林」不僅是形成了一個基於「澳門・美好家園」的情感社群,同時也是一次認同實踐和文化行動,展演了認同力量的行動性和計劃性,以及認同表演從虛擬空間走向現實社會的可能路徑。Castells(1997)在論述「認同的力量」時,已經揭示了身份認同與社會運動之間的內在聯繫,即社會運動需要放置於其特定社會情境並從其中的身份認同中取得合法性和源動力,而反過來在相應身份認同推動下的社會運動也會不斷回饋強化這一源身份認同。為了充分闡釋這一相互關係並加強理論的說服力,Castells 在「合法性身份」「抗拒性身份」之外,提出了「計劃性身份」,指涉全球化網絡社會下,女權主義運動、環保主義運動等社會運動與新的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並暗示在社會運動與身份認同互動過程中社會整體結構的轉化。

雖然「保護龍環葡韻鷺鳥林」行動在一定程度上表演了這種「計劃性身份」的可能性,但是其表演劇目只是傳統保守的「簽名」「請願」,與真正全球化的女權主義思潮、同性平權運動等實際仍有很大的差距,不是成熟的、持續的「計劃性身份」的行動路徑,這同樣是由澳門特定的脈絡以及脈絡下傳統的「中國人」和「澳門人」身份認同所共同決定的。如前文所述,澳門傳統的「中國人」和「澳門人」身份認同其實並不互相排斥,某種程度上甚至是被建構得天然合理渾然一體的。因此,「愛國愛澳」甚至被認為是一種「共謀」,共同定義澳門,定義澳門人特質,進而定義澳門人的行為規範,成為政府規範公民行為、限制社會運動的工具(林玉鳳,2011a)。在「愛國愛澳」身份認同建構方案之下,澳門並沒有像香港那樣建立起具有國際性和本土化的身份認

同(Chou, 2010),相反,卻基本把澳門人定義為澳門這個「寧靜的小城」裡,互相體諒而不愛衝突、彼此和諧而不會抗爭的沈默的、樸素的人群(林玉鳳,2011a)。這種不愛衝突、不會抗爭的小市民在澳門的文學作品中也有所呈現,被描繪為「沒有夢只有低頭的小市民」(賀綾聲,2011),在複雜變動的政治環境中「乖乖低頭接受被支配的現實」(曾一果,2012)。在此規範工具和限制模式之下,澳門人很難在傳統社會中發展出具有衝突性的、成熟意義的「計劃性身份」。

不過,網絡社會為全球化「計劃性身份」的建構提供了機會;澳門網絡社會的發展也為澳門本土化「計劃性身份」增加了可能性和創造性。這種可能性和創造性不僅來自網絡技術的發展,也來自網民主體的變化。2011 年澳門網民年齡構成中,30 歲以下網民佔了接近六成;從上網率來看,18 至 24 歲群體的上網率達 100%,18 歲以下及 25 至 30 歲居民上網率也都接近 100%,青年群體的上網率遠高於其他年齡段(張榮顯、盛綺娜、常雪,2011)。2015 年的最新報告顯示,2012 年至 2014 年基本保持 2011 年的局面,且各年齡段網民上網率均小幅增加(澳門互聯網研究協會,2015b)。換言之,澳門青年世代以幾乎 100%的上網率,成為了真正意義的「網絡世代」,不是使用網絡,而天然地生活於網絡之中(Westlund & Bjur, 2014)。







資料來源:改繪自《澳門數碼生活 2011》,頁 10,張榮顯、盛綺娜、常雪,2011,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

| 表四: | 2012年 | -2014 | 年澳門各 | 年齡層 | 居民 | - 網比例 |
|--------|--------|-------|---------------------|-----------|----|----------|
| 7K E - | 2012 - | 2017 | +/x 10 | T M < / I | ロレ | ニハリンし ブリ |

|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
| 15-24 | 98% | 98% | 99% |
| 25-34 | 95% | 96% | 97% |
| 35-44 | 84% | 86% | 88% |
| 45-54 | 51% | 54% | 70% |
| 55 或以上 | 15% | 28% | 33% |

資料來源:改繪自〈2014 年澳門互聯網使用狀況調查主要結果〉,2015b, 澳門互聯網研究協會。

這些網絡的原住民,被認為更熱衷於社會運動並且在社會運動中更積極、更有創意地運用和生產網絡新媒體(Costanza-Chock, 2012; Fominaya, 2012)。而在這一過程中,青年網民也在體驗新的「認同實驗」(identity experiments; Vakenburg & Peter, 2008),存在實踐某種另類的「計劃性身份」的可能。我們田野觀察也發現了許多以澳門青年為主體、以網絡為基礎的政治社會組織的興起,比如,「三十行動」、「澳門良心」、「愛瞞傳媒」、「新馬路」等。這些網絡青年組織不僅關注傳統的政府監督、政制改革議題,也關注民生問題、文化權利、動物保護、同性戀權益等。與澳門傳統民主組織以漸進式方式在原有政治體制中推進政治改革不同,以「行動捍衛公義,超越開創未來」為口號的這些青年組織,一方面是立足於網絡平台,以網絡為陣地進行政治參與,比如「三十行動」就是由四個不足 30 歲的年輕網民靠自製政治諷刺劇在網絡上一炮打響,「新馬路」是因系列巴士諷刺漫畫在澳門Facebook 平台躥紅,「愛瞞傳媒」則是澳門網絡最主要的惡搞平台;另一方面,在謀求立法會選舉並參與議會政治的同時,他們也傾向於將網

絡上的政治行動延伸成為街頭政治,比如 2014 年 5 月的「反離補法 案」大遊行。

不管是線上行動還是線下行動,這些青年行動者基本都傾向於訴諸 有地方性、有特色的惡搞文化行動。⁶ 對此,「愛瞞傳媒」旗下的《愛 瞞日報》主編崔子釗作出了現實性的解釋:⁷

惡搞諷刺創作可以刺激沉悶的澳門政局,通過更多元化、具有發洩性和喜劇效果的方式和途徑向政治冷漠的澳門人,尤其是年青人,展現本地社會政治問題。因為澳門很多人,對政治也好,對社會事宜也好,你說懶散也好,說冷漠也好,反正對這方面是不熱衷的,並不是很關心。特別是年輕人,如果都是一些很嚴肅死板的東西,他們都不會很想接觸,都會想要抗拒。那不如用一種比較輕鬆的形式,和生活比較接近的形式去讓人接受。現在惡搞的很多題材都是用動漫、電影來包裝,這些生活中經常接觸的東西,年輕人們不會抗拒。那我們就加入一些本地的元素,混合在一起給他們看,就可以引大家討論。比較有成效的是,現在發現澳門因為這些惡搞作品有更多的人在討論和關注相應的政治社會時事。(崔子釗,訪談,2012年4月20日)

由此可見,惡搞文化更多的是因應年輕網民的一種策略選擇,善於

⁵ 惡搞文化是一種特殊的美學實踐,這裡主要是指線民對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影視文化符碼、元素、時事題材、傳聞等進行改造加工,把原本不協調甚至毫不相關的符號元素拼凑在一起,移花接木、顛倒語境,創造出顛覆性的論述、影像,產生意想不到的詼諧或戲劇效果(劉世鼎、勞麗珠,2010)。

⁷ 澳門網絡最主要的惡搞創作組織之一《愛瞞日報》,是一份以惡搞形式諷刺時政的電子刊物(亦有紙質版免費派發),其版面仿照官方立場的《澳門日報》,並以「出紙一大張,瞞遍全澳市民」的口號諷刺《澳門日報》。

在既有的意義、符碼以及論述基礎上加以延伸、挪用、改造、顛覆,從 而將事件戲劇化並生產反抗的破壞性文化資源。因此,這種惡搞文化一 方面具有 Jenkins (2006)所倡導的「參與式文化」的特點,即網民消 解了「牛產」「消費」的界線成為了「消費牛產一體化」的「產消者」 (prosumer; Benkler, 2006; Bruns, 2009) ,既是網絡文化的消費者,也 是網絡文化的牛產者,擁有了重新演繹、自我詮釋的權利;一方面也類 似於歐美地區行動主義者的「文化干擾」(culture jamming),通過挪 用,強化或誇大,以及破壞等方式進行文化抵抗實踐(劉世鼎、勞麗 珠,2010)。而目折年來,這種原本線上的文化活動正被越來越多地運 用到線下,或者線上、線下的協同行動。原本線上虛擬的文化惡搞,正 逐步變成線下實質的文化行動,比如「仆街 CTM」和「抗議綠巴加 價」行動。而且,對於行動的組織者而言,這種從線上到線下的行動路 上談兵惡搞一下就算了呢?其實不是。這只是一個手法而已。如果引發 了大家更關注一些事情的話,那就可以有下一步的行動了。惡搞是首先 要帶給大家一個訊息,告訴他們有這樣一件事情,在他們有共鳴之後, 就可以去組織,一步步地去做。」(崔子釗,訪談,2012年4月20 H)

「仆街 CTM」事件中,CTM 是澳門最大的電信、網絡提供商,其市場壟斷地位以及不匹配的服務、收費常令澳門網民不滿。以往網民對 CTM 的服務,特別是斷網事件,表示不滿,往往通過惡搞的手法表達。比如,有網民把當時熱播電影【保持通話】的海報惡搞成【有得通話】,指責 CTM 網絡中斷無法進行通話、聯絡,海報中央是爆炸的 CTM 標誌,該海報獲得超 2,000 人讚好。

圖十二:網民將當時熱門電影【保持通話】的海報惡搞為【冇得通話】





資料來源:取自 Facebook 網頁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65775400158235&set=a.158212900914486.37247.153478958054547&type=1&theater

在網絡惡搞之外,澳門網民成立「澳門仆街網民」Facebook 群組,開始從線上走到線下,進行實質的文化行動。2011 年 5 月 17 日世界電訊日當天,年輕的澳門網民在澳門人流最密集的議事亭前地商業區CTM 公司外,擺出「仆街」動作,8 以表示對 CTM 的不滿,活動現場形成一種強烈的文化景觀。網民還把活動相片上載回 Facebook 群組,得到逾 3,000 網民的迴響和評論(資料截至:2011/5/19 0:00),如「用行為藝術表達不滿,無聲勝有聲」、「說實話,這是近期最有意思的反霸權行為!」、「反對獨市生意!!!」。時隔一年,澳門網民在

⁸ 「仆街」意指倒地而死、横屍街頭,原為咒駡別人「仆街死」,是粵語的慣用語 及俗語,雷同普通話中的混蛋、去死。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一期 2017年4月

Facebook 上再次發起「仆街快閃」活動,「仆街 CTM」逐漸儀式化為每年世界電訊日的一個節日表演。行動結束後,CTM 派出近 10 名人員聽取網民代表的意見。

圖十三:澳門網民 2011 年 (左)及 2012 年 (右)「仆街 CTM」 快閃行動



資料來源:整合自 Facebook 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macauplanker/

另一個文化行動的案例是澳門網民「抗議綠巴加價」活動。「綠巴」為澳門三間巴士運營公司之一。2012 年 6 月「綠巴」與其他兩家巴士公司向澳門交通局申請巴士服務加價 23%。事件引起社會強烈反彈,更在澳門網絡上不斷發酵,惡搞作品很快充斥網絡。

圖十四:網民以官商勾結為主題惡搞巴士加價事件



資料來源:整合自 Facebook 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saynomacaubuspriceup/

除大量網絡惡搞之外,實質的文化行動也隨之而來。2012 年 7 月 7 日,Facebook 專頁「港澳新一代視訊頻道 IMT Channel」在其 Facebook 首頁發起民意調查,希望通過「按讚」和「分享」表達對巴士公司加價的反對,得到 6,514 人讚好,2,306 次分享,338 則留言,均表示「反對三間巴士公司加價」(資料截至:2012/7/27 24:00)。網民還為遊行活動建立了專門的 Facebook 群組「澳門巴士加價,我反對」,發起並組織了兩個線下公開活動:「7·15 澳門市民反巴士服務費加價遊行」,在 Facebook 上邀請到 9,880 人参加;「反對巴士服務費加價!街頭簽名行動,你我一齊參與!」活動,Facebook 上有 7,269 人参加(資料截至:2012/7/15 24:00)。

圖十五:網民在 Facebook 發起民意調查及「澳門巴士加價,我反對」 群組



資料來源:整合自 Facebook 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saynomacaubuspriceup/

這些活動都發起、動員、組織於網絡,又都從線上走到了線下進行 實質抗議行動,而行動的照片最終從線下回到線上,在 Facebook 群 組、討論區供網民討論、分享、傳播。在線下的實際活動現場,有簽 名、遊行、演講等方式,吸引媒體採訪、拍攝以及市民圍觀參與;同 時,眾多「仆街」、「街頭綠巴」等表演都被及時地放到 Facebook 上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一期 2017年4月

討論。面對網民從線上到線下的行動,以及社會的激烈反彈,政府最後 退讓,表示三家巴士公司在改善服務至達標前,不會繼續審批調升服務 費的申請,而綠巴的申請方案也直接被當局退回。

圖十六:網民組織的反對巴士加價行動之網民街頭表演



資料來源:整合自 Facebook 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saynomacaubuspriceup/

以上兩個案例,澳門網民作為網絡文化的消費者、生產者、參考者、行動者、傳播者,通過惡搞的表演形式組織自主傳播,表達日常生活的不同體驗和訴求,作為一種另類的文化抵抗表演,不僅打開了爭奪話語權、形成反抗霸權力量的另類公共空間,同時也實踐了公民不服從行動(劉世鼎、勞麗珠,2010),展演了年輕網民借創造性文化行動從

線上到線下表演另類計劃性身份的可能路徑。

陸、認同表演作為批判的認同政治

在脈絡化、情境化的前提下,本研究聚焦澳門網絡認同的力量及其 背後的認同的政治,既展現澳門網絡身份認同的政治光譜,也試圖勾陳 這些身份認同之間衝突、曖昧、動態的內在關係。同時,更希望從「表 演」的研究取向,在「什麼」的維度之上探索一個「如何」的過程,即 網民如何具體表演其認同的力量:如何在網絡異質空間抵抗官方主導性 支配性的「愛國愛澳」論述及其「中國人」身份認同方案;如何營造更 有本土意識的「澳門人」情感社群以重建可能的抗拒性身份認同;如何 應對「愛國」、「愛澳」認同的「共謀」而另闢蹊徑借創意行動為年輕 網民的計劃性身份認同提供可能的行動路徑。這三個問題的組織,雖然 是借鑑 Castells 的「合法性身份—抗拒性身份—計劃性身份」的分析框 架來組織澳門網絡認同表演的三個面向,但並不是完全套用並分別驗證 這三種身份認同,而是結合澳門的歷史脈絡和實際情境,通過這種具體 的微觀實踐經驗,對 Castells 的原有框架進行一定的補充與修正:

首先,網絡提供了認同抵抗的異質空間,使傳統的合法性身份認同 自我曝露成為被抵抗的對象、目標和資源。傳統的合法性身份認同更多 的是一種歷史性的政治霸權建構,而且,已經是一種式微的認同力量, 其在網絡空間不僅沒能延續其昔日的主導性支配性地位,反而如同「靶 子」一般,成為凝聚抵抗認同力量的具體對象和明確目標。同時,原來 合法性身份的建構資源,在網絡空間內,反而成為了可供盜獵、挪用和 改造的抵抗資源,網民可在此基礎上進行日常生活的戰術性抵抗。

其次,網絡培育了認同重建的情感社群,使傳統的抗拒性身份認同

有了情感面向和社群基礎。Castells(1997)認為「地方自治主義」或者說「社群主義」(Communalism)是對合法性身份的主要抗拒力量(p. 8),而且很容易依據其所受壓制而劃定出其抗拒的疆界(p. 9)。但是,非西方情境和網絡空間不一定有這種地方自治主義的傳統,也不一定有這種有自治經驗的社群;即使有,比如澳門傳統社團,這種傳統社團也不一定能夠網絡化而實現其網絡存在。因此,新興的網絡社群往往是在網絡空間全新聚集的社群,而非傳統地方社群的網絡化;同時,往往是基於同好、通感、共應等共同情感而聚集的情感社群,而非現實利益共同體以及其自治傳統。同時,這些網絡情感社群的認同重建往往沒有遭受合法性身份的過多壓制,更無所謂抗拒的疆界;相反,它們往往還與其保持某種模糊曖昧的關係,最多只是通過淡化「遠離」而非直接「抗拒」。

再次,網絡發展了認同計劃的行動路徑,特別是可能藉助本土化的文化干擾實踐發展出從線上到線下的行動路徑。這種行動路徑不僅是傳統「社會運動—計劃性身份」——比如「女權運動—女權主義者」——這一計劃性身份模式的網絡擴展,實際也對這種——對應模式提出新的挑戰。在網絡社會,社會運動與計劃性身份之間可能已經沒有必然的直觀聯繫,至少很多從線上到線下的文化實踐者根本來不及「命名」自己的身份認同便又投身到其他文化實踐中,因此,關注的焦點可能不在於「社會運動—計劃性身份」對應模式的兩極,而是處於聯接兩極之間的「實踐者」;比如,青年網民作為網絡原住民世代的崛起,其數字化生存經驗而帶來的實踐另類的「計劃性身份」的可能。這種可能性的開放也進一步說明,Castells的計劃性身份認同概念不應該是「計劃基礎」(project-based)或者「計劃導向」(project-oriented)的身份認同,而應該是一個動態、主動、進行時狀態的「計劃式」(projecting)身份認

同;同時也不應該是一個全球化統編劃一的「女權主義者」之類的計劃 性身份認同,而應該對地方性和另類性實踐經驗持更開放的態度和預期 更多的可能。

除了對於認同力量的實踐經驗和理論補充,在這裡我們還需要思考這種認同力量表演在澳門情境下其背後的現實意義和政治意涵。誠如 Stuart Hall (1990) 所言,身份認同總是對應著相應的認同的政治、立場的政治。認同力量的表演,背後也將牽涉到可能的認同政治的嬗變。 2014 年澳門回歸 15 週年之際,面對香港「兩傘運動」的政治衝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12 月 19 日親赴澳門主持澳門回歸週年慶祝儀式;同時,北京當局也推進澳門變革新路徑,將澳門列入中央政府「一帶一路」的全球戰略,9 希望以此建設一個「對香港有啓發」的「大澳門」,超越香港的認同危機(江雁南、朱永瀟,2014)。但是,2015年的最新民意調查卻顯示,澳門中學生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跌至歷史新低,由 2007 年和 2008 年的超九成認同「我是中國人」跌至 2015年的五成半;相比較而言,對「澳門人」的認同就高達九成以上,遠高對「中國人」的認同感;當他們向別人介紹自己時,七成會稱呼自己為「澳門人」,而會用「中國人」介紹自己的已經不足一成(澳門日報,2015年3月13日)。

面對現實如此巨大的落差,我們似乎還無法將其與上述網絡認同力量的表演建立某種直接的因果聯繫,但是,這卻提醒我們,這種認同力量的傳播和嬗變,可能指涉著一個新的認同政治的浮現。如前文所述,以往的澳門身份認同研究更多的是從自上而下的治理者視角關注認同建

^{9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希望 建立經濟帶實現區域經濟合作,為 2103 年中國提出的對外重要經濟戰略,被認 為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戰略載體。

構方案的建構,而從身份認同的表演性的研究取向,我們卻可以從自下而上的被治理視角,看到以往的被建構者被治理者如何應對自上而下的建構方案而進行自我抵抗、重建和計劃。因此,澳門網絡身份認同的表演,同時也表演了策略性、創造性、能動性、抵抗性的「被治理者的網絡政治」(cyberpolitic of the governed; Liu, 2013),打開了一個權力抗爭、階級重整、社會分層、社區形塑和文化干預的場域,也為網民提供一個批評和情感宣洩的工具,以及顛覆權威話語的方式,並提供了另類的權力軌跡允許網民逾越既有的身份認同(Gong & Yang, 2010)。因此,這種認同表演,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澳門網民「其他途徑的政治」(politics by other means; Liu, 2013)和身份認同上的的一種「政治宣言」(Jenkins, 2006)。這種認同政治本質上是一種不服從的批判政治,表現了「不想被那樣治理」的批判精神,表達了對認同和主體屈服化的拒絕,甚至是從根本上「對我們是誰的拒絕」(Crampton, 2003),而這也正是 Foucault 所宣稱的「批判」的意義所在:

批判是主體給予自己權力去質疑真理的權力效果以及權力的真理話語的運動……批判是一種自發的不服從和不被駕馭的藝術。批判根本上在我們稱之為真理的政治的脈絡中,確保主體的去屈服化(Foucault, 2007, p. 47)。

參考文獻

張愛華、謝成盛(2015 年 10 月 19 日)。〈澳大學生愛上社交媒體 臉書微信最受歡迎〉,《澳大人》。取自 https://e-myum.co.umac.mo/feature_oct2015-2/〈澳生國民身份認同急降 學聯倡國民教育兼顧「一國兩制」〉(2015 年 3 月 13 日)。《澳門日報》,第 A06 版。 仇國平(2011)。〈從國家與市場力量驅動角度,研究香港與澳門國民身份的建立

- 及演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台北。
- 江雁南、朱永瀟(2014年12月28日)。〈澳門變革啟示香港超越認同危機化解深層次矛盾〉,《亞洲週刊》,28(51):84-89。
- 余振、呂國民(2007)。〈大眾政治文化〉,黃紹倫(主編),《澳門社會實錄: 從社會指標看生活素質》,頁 30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 吳國昌(1987)。〈批判「尖澳門意識」,重建「澳門問題」〉,《澳鏡》,1。
- 周大鳴、李居寧(2007)。〈澳門回歸後土生葡人的調適與群組認同〉,《開放時代》,2:125-138
- 林玉鳳(2011a)。〈媒體、身份認同與公民社會——以澳門為例〉,《第 8 屆 「媒介與環境」國際學術研討會》,頁 127-140。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
- 林玉鳳(2011b)。〈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文化雜誌》,78。
- 張元元(2009)。《澳門法治化治理中的角色分析》。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 制研究中心。
- 張榮顯、盛綺娜(2011)。《澳門互聯網使用現狀統計報告》。澳門: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
- 張榮顯、盛綺娜、常雪(2011)。《澳門數碼生活 2011》。澳門:易研網絡研究實 驗室。
- 陳雪雲(2002)。〈全球風險、知識與終身學習〉,《社會教育學刊》,31:19-54。
- 曾一果(2012)。〈去殖民化以來「澳門意識」的媒介建構——以《文化雜誌》 「中文版」為研究對象〉,《全球傳媒學刊》,12:18-36。
- 賀綾聲(2011)。〈小市民沒有夢沒有夢只有低頭〉,《文化雜誌》,78。
- 黃歆、劉暢(2014 年 12 月 16 日)。〈「愛國愛澳」寫進澳門《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新華網》。取自
 - 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4-12/16/c 1113667522.htm
- 劉世鼎、勞麗珠(2010)。〈網絡作為澳門的另類公共領域〉,《新聞學研究》, 102: 253-293。
- 黎熙元(2005)。〈難以表述的身份——澳門人的文化認同〉,《二十一世紀評論》,12:16-27。
- 黎熙元(2008)。〈澳門的社團網絡與國族認同〉,郝志東(編),《國家認同與兩岸未來》(頁 159-178)。澳門:澳門大學中心出版社。
- 澳門互聯網研究協會(2015a)。〈互聯網普及程度:網民數及上網率〉。取自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
 - http://www.macao internet project.net/index.php/blog/2014/07/AdoptionRate/3/%E 6%BE%B3%E9%96%80%E4%BA%92%E8%81%AF%E7%B6%B2%E8%AA% BF%E6%9F%A5%E7%B5%90%E6%9E%9C/0

- 澳門互聯網研究協會(2015b)。〈2014 年澳門互聯網使用狀況調查主要結果〉。 取自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
 - http://www.macaointernetproject.net/index.php/blog/2014/07/20140703a/0//0
- 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2008年12月)。《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研究報告》。取自澳門青年研究協會 http://www.myra.org.mo/?p=65
-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5 年 4 月)。《2014 年住戶使用資訊科技調查》。取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 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Social/%E4%BD%8F%E6%88%B6%E4%BD%BF%E7%94%A8%E8%B3%87%E8%A8%8A%E7%A7%91%E6%8A%80%E6%83%85%E6%B3%81/2014%E5%B9%B4%E4%BD%8F%E6%88%B6%E4%BD%BF%E7%94%A8%E8%B3%87%E8%A8%8A%E7%A7%91%E6%8A%80%E8%AA%BF%E6%9F%A5.aspx
- 鍾庭耀(2001)。〈港澳兩地回歸週年民情比較〉,吳志良、楊允中(編),《澳門2001》(頁143-158)。澳門:澳門基金會。
-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UK: Verso.
-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runs, A. (2009).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Butler, J.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astells, M. (1996).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I: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UK: Blackwell.
- Castells, M. (1997).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II: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UK: Blackwell.
- Chou, B. (2010). Build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and Macao. *East Asia Policy*, 2(2), 73-80.
- Costanza-Chock, S. (2012). *Youth and social movements: Key lessons for allies*. Cambridge, MA: Born This Way Foundation &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 Cover, R. (2012). Performing and undoing identity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identity theories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of online profiles and friendship regimes. *Convergence*, 18(2), 177-193.
- Crampton, W. (2003). *The political mapping of cyberspac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 Certeau, M. (2002).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 Rendall, Tra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4)
- Dimitriadis, G. (2009). Performing identity/performing culture: Hip hop as text, pedagogy, and lived practic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 Doran, K. (2012). Performative identity in networked spaces: Resisting the logic of late

- *capit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Undergraduate Honors Theses 279). Retrieved from http://scholar.colorado.edu/honr-theses/279
- Fominaya, C. F. (2012). *Youth participation in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cial movements*. Brussels: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 Foucault, M. (1986).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16(1), 22-27.
- Foucault, M. (2007). The politics of truth. Los Angeles, LA: Semiotext(e).
-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Gillis, J. (1994).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In J.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ng, H. M., & Yang, X. (2010). Digitized parody: The politics of egao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24(1), 3-26.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pp. 222-237). London, UK: Lawrence and Wishart.
- Hall, S.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 Hall, D. Held, & A.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pp. 274-316). London: Polity Press.
- Hetherington, K. (1998). Expressions of identity: Space, performance, politics. London, UK: Sage.
- Hine, C.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Jansen, T., Finger, M., & Wildemeersch, D. (1998). Reframing reflectivity in view of adult education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conciling the irreconcilable. In D. Wildermeersch, M. Finger, & T. Jansen (Eds.), Adult educ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pp.239-250). Europa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d, DE: Peter Lang.
- 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aeding, M. P. (2010). The evolution of Macao's identity: Toward ethno-cultural and civic-bas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9(1), 133-168.
- Kozinets, R. V. (2006). Netnography. In V. Jupp (Ed.), *The sage dictionary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pp. 135). London, UK: Sage.
- Kozinets, R.V. (2010). Net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line. London, UK: Sage.
- Krips, H. (2007, December). *The politics of badiou: From absolute singularity to objet-a.*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Claremont.
- Lam, W.-M. (2010). Promoting hybridity: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Macau identity. *The China Quarterly*, 203, 656-674.
- Liu, S. D. (2013). The cyber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4(2),

252-271.

- Maffesoli, M. (1996).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London, UK: Sage.
- Nakamura, L. (2002).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NY: Routledge.
- Ngai, G. M. C. (1999). Macau's identity: The need for its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o the next century. *Portuguese Studies Review, 2* (Spring-Summer), 112–128.
- Poster, M. (2001).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Interne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ostmes, T., Haslam, S. A., & Swaab, R. I. (2005).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influence in small groups: communication, consensualization and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6*, 1-42.
- Ramos, A. G. (2004). Performing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Puerto Rico. *Pouviors dans la Caribe*, *14*, 63-80.
- Tan, K. J. (1999). Secondary school history curricula. In M. Bray, & R. Koo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and Macau: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pp. 171-194). Hong Kong, C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ang, K.-C., & Bray, M. (2000). Colonial models and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 systems: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u. *Journal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38(5), 468-485.
-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Oxford, UK: Polity Press.
- Vakenburg, P. M., & Peter, J. (2008). Adolescents' identity experiments on the Internet: Consequences for social competence and self-concept un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2), 208-231.
- Westlund, O., & Bjur, J. (2014). Media life of the young. Young, 22(1), 21-41.

Performing Identity a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Macau Netizens' Practical Experience

Zhongxuan Lin*

ABSTRACT

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power of identity in Macao cyber world, with the problematic consciousness of power relation, resistance, and critiques in cultural studie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primarily according to virtual ethnography method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about the performativity of the power of Macao netizens' identity: how Macao netizens performed their resistance to the dominant legitimizing identity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heterotopia of the cyber space; how Macao netizens constructed online affective communities to restructure their "Macanese people" identity with particularity and subjectivity; how Macao netizens encountered the conspiracy of the identity projects of "loving the country and loving Macao" and conducted creative cultural activisms from online to offline to demonstrate the possible action trajectories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lternative project identity of the youth.

<u>Keywords</u>: Activism, Community, Heterotopia, Identity, Internet, Perform

^{*} Zhongxuan Lin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一期 2017年4月